

人口教育與香港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鄭宏泰 陸觀豪

當前香港正面對尖銳的人口結構中生育率急速下滑、老齡化急速上升的問題，由此帶來的不但是醫療及老人照顧負擔逐步加重，還有大中小學校收生漸見減少，不少年輕港人近年選擇移居他方，則令問題嚴重性加劇。另一廂邊，在美國發起遏制中國發展政策的影響下，尤其在歐美等地的海外華人遭到不同層面的歧視或針對，給他們生活和工作等不同層面帶來壓力或威脅，當中不少海外華人因此正在籌謀轉移投資、另覓安全居所，或是安排下一代到其他地方求學生活，分散風險。

爭取海外華人來港就學

無論是自然生育無法配合社會發展的問題，抑或是海外華人遭到歧視針對的問題，香港歷史上的發展經歷，均可提供借鑑參考。從歷史看，香港長期出現本地人口小於移民人口，以及自然出生率低於自然死亡率的情況，但香港總人口卻能持續大幅攀升，由1841年約7000多人大幅飆升至今的700多萬人，這主要是不同時期均有大量移民人口流入之故。按此發展經歷，解決方法除了鼓勵生育，便是吸納外部移民，至於移民中的絕大部分雖來自內地，但亦有一個不少比

例其實是海外華人回流。

正如筆者早前文章提及，香港發展成轉口港的過程中，不但是促進貨物、資金及資訊往來，更有勞工、人力進出，華工出洋更曾屬人力進出的主要部分。

至於海外華人在旅居地經商、工作與生活，又非長期風平浪靜，而是常遭針對、歧視，其中又以十九世紀末美國排華法案、二十世紀初澳洲白澳政策，以及二十世紀中葉印尼排華運動等重大歷史事件常被引述，給海外華人無數家庭帶來巨大衝擊，留下心理陰影。

由於香港曾經是華工出洋的重要管道，在海外生活又常透過香港與家鄉桑梓聯繫，互通有無，因此不但對香港社會及制度十分熟悉，亦別具親切感，同時亦對香港的自由開放、連結華洋中外等特質印象深刻，所以無論是在美國、澳洲，或是東南亞等地遭到排擠，或是遭遇挫折時，除了返回故鄉，便是轉居香港。即是說，當海外華人在旅居地遇到什麼風吹草動時，首先想起的退守之地便是香港，原因是香港社會自由開放，乃理想事業發展及定居之地。

按非正式估計，現時海外華人總數約在3000萬至6000萬之間，散居世界各地不同角落，但以東南亞居多，不少海外華人在旅居地更已定居多個世代，對西方事物、語言、制度及生活方式較適應。

他們本來或者亦以定居地為長期扎根生活的地方，但沒想到現時卻碰上中美角力、地緣政治急速變遷，他們頓成磨心，因此難免須為個人、家族的下一步或下一代再作綢繆，香港作為連結海外華人中樞的地位，再次突顯出來。

歷史上，海外華人曾在不同階段為祖國及香港的建設作出巨大貢獻，不但是孫中山推動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甚至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尤其曾經指出「海外關係是個好東西，可以打開各方的關係」，全面扭轉了文化大革命或四人幫弄權時期對海外華人的不信任和敵對看法。至於香港則長期以來成為海外華人與國家溝通聯繫的橋樑，同時亦是外地出現排華活動時海外華人退守落腳之地。

大力開拓中學寄宿教育

面對當前出生率持續下滑、人口日趨老齡化，而美歐日又出現歧視或針對海外華人苗頭、中美角力可能曠日持久且會日趨熾烈的新形勢下，香港若能把握歷史機遇，推出有效結合人口與教育的政策，尤其吸納海外華人前來定居投資，則必可為香港經濟與資本市場注入活力。

另一方面，哪怕不少海外華人或者覺得現時未有迫切需要，須再作移民離開多年或多個世代生活的地方，但或者會為年幼子女的教育另作打算，香港可順應內外發展趨勢推出更具彈性的

政策，例如開放本地私立中學教育，設立寄宿學校，吸引非本地學生，讓那些有意到香港升讀中學的海外華人子女到來求學，這樣尤可更好地打造香港教育的國際化。

須進一步指出的是，過去我們一直強調把香港打造為教育樞紐時的焦點，主要只集中於高等教育層面，忽略了中學層面。其實，中學層面亦十分重要，質素亦極佳，若能大力開拓，例如吸引海外華人年幼子女前來求學，入讀大中小學，則必能支持不同層面教育、培訓及文化交流等發展，激活教育產業。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前來就讀大學或中學，這些海外學生中的一個不少比例，最後應會定居下來，成為香港人口的生力軍，這可填補青年人口不足問題。至於海外華人後代在港求學，更緊密地接觸中國文化，學習中英文，則有助培養民族凝聚力與認同感。就算他們日後返回原來定居地，亦能更好地充當「文化大使」，說好香港及國家故事。

說實在的，放在教育上的投資，是穩賺不賠的，只是賺多賺少、短賺長賺差別而已，值得政府認真考慮。

大勢與定位，四之三

鄭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學全球中國研究計劃聯合召集人、亞太研究所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陸觀豪是退休銀行家，亞太研究所名譽研究員、工商管理學院客座教授